

蘇軾《東坡志林》成書考——兼論五卷本 與十二卷本的關係

梁樹風*

一、前言

蘇軾(1037–1101)《東坡志林》，今流傳一卷本、五卷本、十二卷本三個系統。¹三個系統中，學界普遍認為一卷本和五卷本最接近蘇軾所撰的《志林》面貌，故注解、評論最多。然而，南宋初年的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如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1120年以前成書)、舊署王十朋(1112–1171)《東坡詩集注》、郎晔《經進東坡文集事略》(1191年以表進呈)、施元之(1110–1177)、顧景蕃合注的《註東坡先生詩》(下稱《施顧註蘇詩》)，引述的《志林》內容，都不並見於現存的任何一系統，當中不少文字，更是這三個系統沒有收錄的。究竟這些內容，是純粹好事者輯錄成書，抑或蘇軾在生時已有意為之？又，三個系統中，以哪個系統最近此書原先的狀況？這些問題，均影響我們認識和了解蘇軾晚年的生活和著作，也是研究《志林》不可不察的地方。

就出版與研究的傾向來看，現今學界普遍認為明朝趙開美(1563–1624)刊行的五卷本《志林》最接近蘇軾撰作的面貌。1919年，涵芬樓以趙開美五卷本《東坡志林》為

本文曾於馬來西亞拉曼大學中華研究中心(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主辦的「傳統、遞進與發展——2016馬來西亞中國古典詩歌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得與會學者給予寶貴意見，復蒙諸位匿名評審及學報編輯鄭麗娟先生惠示高見，謹致謝忱。

* 梁樹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講師

¹ 另毛晉(1599–1659)刊有二卷本《志林》。此書為毛晉在天啟元年(1621)，與《米元章志林》合刻，題曰《蘇米志林》。此書雖名「志林」，實際上是毛晉所編的《蘇子瞻外紀》。毛晉在《米元章志林·跋》中嘗云：「辛酉秋，偶編《東坡外紀》，友人索余合元章梓行，因檢向來拾得者，錄成一冊，略無詮次。」可見此書乃毛晉編訂，非「志林」善本，故本文不作討論。關於毛晉此書的成書及其中問題，筆者在〈毛晉二卷本《志林》的成書與其文獻價值〉，《馬來西亞漢學刊》創刊號(2017年)，頁43–55，有較詳細的討論。二卷本《志林》見毛晉(輯)：《蘇米志林》，《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85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啟五年(1625)毛氏綠君亭刻本影印(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6年)。

底本校印，並附夏敬觀(1875–1953)〈跋〉，云：「要為宋人所輯，則可信也。」² 自後校注本的整理、³ 論文、專書的論述，⁴ 大多以五卷本《志林》為分析對象。⁵

章培恒、徐艷雖然在〈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兼談十二卷本《東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一文，指這部五卷本「實係真偽雜糅之書」，但從其對十二卷本「不僅出於五卷本《志林》之後，且將五卷本中除『論』的一卷外的絕大多數文章收入，……可見也是一部真偽雜糅的書」的判斷來看，⁶ 也傾向於五卷本的內容比較可取。

固然，若果我們只糾結於在幾種《志林》版本中作分析、推論，最終只會陷入循環論證的窘境，所以本文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會以宋元間文獻所載為證，並把這些資料分作三類以作引用：第一類是成書於南宋的蘇軾年譜、詩文注釋。這類資料最接近蘇軾的年代，而且整理者對蘇軾有相當的認識，最為可信。第二類是引錄《志林》的南宋文獻。這類文獻接近蘇軾的年代，所見資料理應未經大規模增刪。第三類是引錄《志林》的元代文獻，與第一、二類相比，這類資料距蘇軾的年代較遠，故本文在論述中主要作參考之用。

² 蘇軾：《東坡志林》（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涵芬樓本，〈跋〉，頁一下。

³ 校注本如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華東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點校注釋）：《東坡志林》（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與《仇池筆記》同本）；劉文忠（評注）：《東坡志林》（北京：學苑出版社，2000年）；趙學智（校注）：《東坡志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3年）；劉文忠（評注）：《插圖本東坡志林》（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王晉光、梁樹風（譯注）：《東坡志林》（香港：中華書局，2014年）。

⁴ 論文、專書如周先慎：〈《東坡志林》初探〉，《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2年第2期，頁69–79；孫蘭廷：〈《東坡志林》初探〉，《內蒙古師大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4年第2期，頁65、101–5；姚學賢：〈試談《東坡志林》的藝術特色〉，《信陽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頁50–56；何鳳奇：〈《東坡志林》研究三題〉，《齊齊哈爾師範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6年第4期，頁89–93；王洪：〈試論《東坡志林》的寫意藝術〉，載王洪：《蘇軾詩歌研究》（北京：朝華出版社，1993年），頁245–59；安芮璿：〈宋人筆記研究——以隨筆雜記為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年）；楊芸：〈借冰山一角，鑒廬山真貌——論《東坡志林》於蘇軾文化人格研究之價值〉（成都：四川師範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劉丹：〈《東坡志林》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碩士論文，2008年）；李月琪：《蘇軾《東坡志林》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8年）；袁旭龍：〈蘇軾筆記二種研究——《東坡志林》、《仇池筆記》〉（保定：河北大學碩士論文，2012年）。

⁵ 按：本文雖主張五卷本成書在後，但考慮到五卷本通行日久，且多為研究者所引用，為便捷讀者，下文除特別標明外，引文皆依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

⁶ 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兼談十二卷本《東坡先生志林》的可信性〉，《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173。關於章培恒、徐艷文章的論述，下文將詳細討論。

二、南宋初年的《志林》面貌

學界所以偏重五卷本，無疑與五卷本收錄了十三篇「史論」有關。宋邵博（？-1158）《邵氏聞見後錄》載蘇軾兒子蘇過（1072-1123）的一番言論：「東坡先生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惜哉！先生胸中尚有偉於武王非聖人之論者乎？」⁷蘇軾當日本打算撰寫百篇的《志林》，惜只完成十三篇便病逝，此「武王非聖人」就是今天所見五卷本《志林》卷五的首篇文字，而十三篇史論也正是五卷本卷五的內容。

這十三篇史論同時也是今天流傳一卷本《志林》的全貌，《東坡後集》、《百川學海》、一百卷本《說郛》均只載錄一卷本的《志林》。⁸無容置疑，從蘇過的說話可見，這十三篇史論肯定是蘇軾所撰，而且也是《志林》的重要組成，但我們是否就能依此判斷只有一卷本又或載錄此一卷的五卷本才接近當日「志林」的面貌？

陳振孫（1179-1262）《直齋書錄解題》於「《東坡手澤》三卷」的敘述也頗影響後人的判斷：「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⁹若僅就今天所見的十三篇史論來說，把這十三篇文字分作三卷顯然是不合常理的，如是，在一卷十三篇史論外，把其餘兩卷各分為二，便成「五卷」之數，這樣看起來好像比較合理，《四庫提要》便云：「此本五卷，較振孫所紀多二卷，蓋其卷帙亦皆後人所分，故多寡各隨其意也。」¹⁰王松齡在《東坡志林·點校說明》中也持這種看法：「一卷本僅載史論而無雜說，定非《志林》全貌。朱熹（1130-1200）《五朝名臣言行錄》引《志林》雜說不少，可證《百川》本（一

⁷ 邵博（撰），劉德權、李劍雄（點校）：《邵氏聞見後錄》（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112。雖然邵博《聞見後錄》載蘇軾兒子蘇過這樣的敘說，惟後世持這種觀點（一卷本為《志林》本貌）者不多。錢謙益〈跋東坡志林〉主此，云：「馬氏〈經籍考〉：『《東坡手澤》三卷。』陳氏（陳振孫）以為即俗本《大全》中所謂《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載《東坡後集》者，皆辨論史傳大事。世所傳《志林》則皆瑣言小錄，雜取公集外記事跋尾之類，摺拾成書，而譌偽者亦闌入焉。公北歸〈與鄭靖老書〉云：『《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篇。』則知十三篇者，蓋公未成之書，而世所傳《志林》者繆也。宋人編公外集，盡去志林、詩話標目入之雜著中，最為有見。近代所刻《仇池筆記》、《志林》之類，皆叢雜不足存也。」惟錢謙益此論未能解釋馬端臨〈經籍考〉所載「手澤」卷數和宋、元年間文獻所引非一卷本《志林》的問題。馬氏的論說見《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年），卷216，總頁1764。錢謙益的論說見《牧齋初學集》（上海：涵芬樓，1929年影印崇禎瞿式耜刻本），卷八五，頁三上至三下。

⁸ 詳見蘇軾：《東坡後集》，收入《東坡七集》（臺北：中華書局，1966年影印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四部備要》本），卷十一；左圭（纂）：《百川學海》（臺北：新興書局，1971年影印民國十六年〔1927〕武進陶氏覆宋刊本），第十四冊，戊集上；陶宗儀（編）：《說郛》，收入《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涵芬樓百卷本），卷九五，頁一上至十五上。

⁹ 陳振孫（撰），徐小蠻、顧美華（點校）：《直齋書錄解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卷十一，頁329。按：《東坡志林》的著錄最早見於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

¹⁰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一二零，頁二二上。

卷本)之前《志林》非僅載史論而已。商刻十二卷本皆雜說而無史論，甚為蕪雜，頗有偽竄，文字訛誤不少，不為世所重；……趙刻五卷本前四卷為雜說，第五卷為史論，此本取去較為精審，過去一般認為它是宋人所哀錄，故《四庫提要》以之著錄。¹¹

然而這樣的推論基於一個很重要的前設：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記的「三卷」包含了十三篇「史論」。然而，從宋代引錄《志林》的資料所見，似乎還存在另一種可能。

(一)「志林」非單一書書名

南宋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至卷十四〈論〉收錄「志林」的十三篇史論，當中郎曄的注釋尤值得注意：

自此以下十六篇，謂之志林，亦謂之海外論。¹²

就此一語來看，郎曄所指的「志林」就只有十六篇，¹³而這十六篇除可稱為「志林」，也可以稱為「海外論」。若以郎曄這一語判斷，似乎只有一卷本「志林」才是蘇軾所撰《志林》的面貌；然而郎曄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中引述「志林」作注釋者凡六，但六則文字均非取自此「十六篇」。

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呂祖謙(1137-1181)的三部著作中：《宋文鑒》以〈志林〉為篇題，收錄一卷本《志林》的「司馬遷二大罪」、「趙高李斯」兩則文字；¹⁴《增注古文關鍵》卷十二錄一卷本《志林》的「孔子墮三都」外，¹⁵卷十三〈錢塘勤上人詩集敘〉蔡文子注還引述了非一卷本《志林》所載的「題文忠公送惠勤詩」；¹⁶《觀瀾集注》乙集卷五〈東坡詩(并敘)〉引述《志林》兩則，「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都不出於一卷本《志林》。¹⁷

¹¹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點校說明〉，頁3。

¹² 蘇軾(撰)、郎曄(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續修四庫全書》第1315冊據民國八年(1919)上海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宋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十二，頁一上。

¹³ 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十二至卷十四收錄「志林」十六篇，其中〈范蠡論〉、〈子胥論〉在一卷本中原為一文，另加入〈宋襄公論〉、〈士燮論〉兩篇。又，郎曄在編輯時，卷十四〈始皇論〉分上中下，故得十六篇之數。此本與他本分篇不同，大抵與下文所論《志林》一書不設標題的情況有關。

¹⁴ 呂祖謙(編)、齊治平(點校)：《宋文鑒》(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卷九八，頁1372-76。

¹⁵ 呂祖謙(輯)、蔡文子(注)：《增注東萊呂成公古文關鍵》，《續修四庫全書》第1602冊據北京圖書館藏宋刻本影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卷十二，頁五下至八上。

¹⁶ 同上注，卷十三，頁四下。

¹⁷ 林之奇(編)、呂祖謙(集註)：《東萊集註類編觀瀾文集》，《宛委別藏》影印清嘉慶御覽本(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乙集，卷五，頁四下。按：這兩則文字，前者見於十二卷本的《志林》，後者見於五卷本和十二卷本的《志林》。

考呂祖謙《宋文鑒》所載文章，都直接著錄標題，如與〈志林〉同收錄於卷九十八的蘇軾〈留侯論〉、〈孔子從先進論〉、〈續歐陽子朋黨論〉，¹⁸ 所載標題均與今本《蘇文忠公全集》無異，唯獨〈志林〉一篇收錄兩則見於一卷本《志林》的文字。若然我們把這現象與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的分篇情況結合起來，大可推想《志林》當日很可能是沒有細分篇名，而今天所見的一卷本《志林》，也確實保存了這種不分篇的體例。

由是，若然當日郎曄、呂祖謙所見的《志林》乃一部結合十三篇史論和其他雜說的書籍，他們決不會僅以「志林」一名統稱十三篇史論，更不會直接以「志林」為題而刊載其中兩文。可見他們當日所見、所記，根本是兩部內容截然不同的「志林」，一部只載錄十三篇史論，即今天所見一卷本《志林》，而另一部則載錄蘇軾其他雜說的《志林》。

（二）「雜說」《志林》的成書

這部「雜說」《志林》，以散論雜說為主，組織雖不像十三篇史論的一卷本《志林》那樣清晰明確，但也備受當時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的重視，如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王十朋《東坡詩集注》、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施元之、顧景蕃《施顧註蘇詩》都嘗引錄此本「雜說」《志林》。

關於此本「雜說」《志林》的內容，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在「《東坡手澤》三卷」下有這樣的敘述：「今俗本《大全集》中所謂《志林》者也。」¹⁹ 從「所謂」二字可見，這部《手澤》的「志林」當與「他本」的「志林」有別，在「《東坡別集》四十六卷」下，陳振孫有更明確說明：

坡之曾孫給事嶠季真刊家集於建安，大略與杭本同。蓋杭本當坡公無恙時已行於世矣。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亦雜以穎濱及小坡之文，且間有訛偽勦入者。²⁰

可見當日流傳的《東坡集》，以杭本最早。陳振孫甚至認為此本早於蘇軾在生時已編定；至於當日流傳麻沙書坊的《大全集》，大抵經後人整理增添，並載錄「志林」、「雜說」之類的文字。陳振孫這裏所提及的「志林」，明顯就是專指三卷本的《東坡手澤》。蘇軾弟蘇轍（1039–1112）也曾提及《手澤》一書：

政和元年冬，得侄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其一曰：「子由寄《老子新解》，讀之不盡，廢卷而歎；使戰國有此書，則無商鞅；使漢初有此書，則孔子、老子為一；使晉、宋間有此書，則佛老不為二。不意老年見此奇特。」然後知此書當子瞻意。²¹

¹⁸ 《宋文鑒》，卷九八，頁1368–72。

¹⁹ 《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一，頁329。

²⁰ 同上注，卷十七，頁502–3。

²¹ 蘇轍：《老子解》（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卷4，頁65。

此則文字，今見於十二卷本《志林》的卷五，²²一卷本、五卷本都沒有收錄。元陶宗儀（1329–1410）一百卷本《說郛》收錄15則《東坡手澤》，內容都不見於一卷本《志林》，見於五卷本者有8則，見於十二卷本者有14則，只有「益智」一則文字三本都沒有收錄。²³可見《手澤》所載的文字，確是今天五卷本和十二卷本《志林》的重要組成。

至於《手澤》的內容，黃庭堅〈跋東坡敘英皇事帖〉有這樣的記載：

余嘗評東坡善書，乃其天性。往嘗於東坡見手澤二囊，中有似柳公權、褚遂良者數紙，絕勝平時所作徐浩體字。又嘗為余臨一卷魯公帖，凡二十許紙，皆得六七，殆非學所能到。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²⁴

從「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一語可見，《手澤》中不少文字應是蘇軾有意為之，並希望藉此告誡讀者。這種取態，在《說郛》所收錄的15則文字中也可察見一二，如「論霍光」云：「特其事祕，史無緣得之。著此者，亦欲後人微見其意也。武王數紂之罪，孔子猶且疑之。光等疏賀之惡，可盡信耶？」「絕慾為難」亦言：「予愛其語有理，故為記之。」²⁵

這與一卷本「志林」的十三篇史論可謂一脈相承，如〈秦廢封建〉結尾云：「柳宗元之論，當為萬世法也。」〈攝主〉結尾亦云：「故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²⁶時人對此甚為稱道，如龔明之（1091–1182）便欲仿效蘇軾這種「有戒於人」的取向，並以「志林體」稱之，其〈中吳紀聞序〉便這樣說：「談諧嘲謔，亦錄而弗棄，蓋效蘇文忠公《志林》體，皆取其有戒於人耳。」²⁷若我們仔細考察一卷本《志林》的十三篇史論，便會發現這十三篇都是歷史評論，內容比較嚴肅，談不上甚麼「談諧嘲謔」之言，故龔明之在這裏所說的，大抵就是專指這部「雜說」《志林》。²⁸

²²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會稽商氏刊本，卷五，頁一上。

²³ 《說郛》，卷二九，頁三下至六下。

²⁴ 黃庭堅：〈跋東坡敘英皇事帖〉，載劉琳、李勇先、王蓉貴（校點）：《黃庭堅全集》（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01年），頁773。

²⁵ 《說郛》，卷二九，頁四上至四下。

²⁶ 《東坡後集》，卷十一，頁四下、十下。

²⁷ 龔明之（撰）、孫菊園（點校）：《中吳紀聞》（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序〉，頁1。

²⁸ 至於這部「手澤」後來何以易名「志林」，《四庫總目提要》謂：「刊軾集者，不欲以父書目之，故題曰《志林》耳。」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曾作辯，謂「其手寫付諸子者，自其生時，已名《手澤》，當必軾所自名，故不以語忌為嫌。《提要》泥於《禮記》『公沒而不敢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之語，以為必其身後子孫之所命名，非也。」當然，「手澤」一名固為蘇軾在生時已有，這點在黃庭堅〈跋東坡敘英皇事帖〉「手澤袋蓋二十餘」一語中便能察看，

[下轉頁33]

三、「雜說」《志林》的內容

若然我們相信南宋初年確實有一部非一卷本的《志林》，即「雜說」《志林》，那麼我們可以肯定，今天所見五卷本、十二卷本均非南宋初年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撰者所見的本子。因為就現存的資料所引「志林」內容，都不能並見於現存的五卷本和十二卷本中，如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次韻滕大夫》引「雪浪石銘」，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錢塘勤上人詩集敘》注引「題文忠公送惠勤詩」，施元之、顧景蕃《施顧註蘇詩·東陽水樂亭》注引「錢塘、東陽皆有水樂洞」等語，²⁹這兩個系統均沒有收錄。當中五卷本存16則，缺收19則；十二卷本存26則，缺收9則。如是，若然我們貿然依據其中一本，分析這部「雜說」《志林》的內容，顯然是不切實際，也無法窺探其貌，故本部分的討論主要依據南宋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引錄的「志林」內容，尤以其並見於五卷本或十二卷本者為主。

(一) 不載北宋、南宋所刊本集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這部「雜說」《志林》的內容多不載錄於北宋以至明初的蘇軾《本集》，³⁰可見其成書有別於蘇軾其他的文稿，³¹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所記「《大全

〔上接頁32〕

但在編集者的角度來看，《四庫總目提要》所言又未必無據，蘇轍在跋《老子解》中曾提及《手澤》一書，曰：「政和元年冬，得侄邁等所編《先公手澤》。」從「先公手澤」一語來看，「手澤」之名的確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禮記》之意，故編者如此改易，亦有其考慮之處。詳見《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二零，頁二二上；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9年），頁794；蘇轍：《老子解》，頁65。

²⁹ 王十朋（注）：《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四部叢刊》影印南海潘氏藏宋刊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卷八，頁二六上至二七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六，頁八上至八下；施元之、顧景蕃（合注），鄭騫、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臺北：藝文印書館，1980年），卷七，頁十五下。

³⁰ 茅維編集《蘇文忠公全集》時，曾據五卷本的《東坡志林》而增益，在此以前所刊的蘇軾《本集》，包括《東坡集》、《東坡後集》、《三蘇先生文粹》、《東坡七集》等，都沒有收錄這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所引述《志林》的內容。其中《東坡七集》中《續集》有三篇雖能與《志林》所載「雪浪石銘」、「李委吹笛」、「人生死自坎離」有所對應，但收錄的文字出入頗多，這點下文將就「李委吹笛」一則文字作詳細的分析。相關文獻見《東坡集》（東京：汲古書院，1991年）；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編）：《東坡集》（北京：綫裝書局，2001年）；與《東坡後集》同本）；全國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編）：《三蘇先生文粹》（北京：綫裝書局，2003年）；蘇軾：《東坡續集》，收入《東坡七集》。

³¹ 按：南宋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引述蘇軾這些雜說的時候，都只引錄《志林》，而不引錄《百斛明珠》、《仇池筆記》、《東坡題跋》等，可見這些編者更重視《志林》一書，也就是說這部《志林》所載的內容，更可確信為蘇軾親撰。

集》」，亦是把這部分的內容別列出來刊錄。³² 當中不少文字，還保留蘇軾交付兒子的痕跡，如今天流傳的五卷本和十二卷本《東坡志林》收錄了「遊白水書付過」：

紹聖元年十月十二日，與幼子過遊白水佛迹院，浴於湯池，熱甚，其源殆可熟物。循山而東，少北，有懸水百仞，山八九折，折處輒為潭，深者礎石五丈，不得其所止。雪濺雷怒，可喜可畏。水厓有巨人迹數十，所謂佛迹也。暮歸倒行，觀山燒，火甚，俛仰度數谷。至江山月出，擊汰中流，掬弄珠璧。到家二鼓，復與過飲酒，食餘甘煮菜，顧影頹然，不復甚寐。書以付過。東坡翁。³³

這篇文章以記遊為主，記載蘇軾與兒子蘇過到白水佛迹院一帶遊覽。蘇軾以文字記載了這段遊歷後，交給了蘇過，還題下了「書以付過。東坡翁」七字。若然我們把這與黃庭堅記下《手澤》「輒付諸郎入袋中」的成書情況對應起來，便大可理解這七字的用意，而蘇軾這種舉動，也表明了他是有意把這一類文字與他的其他著作區別開來。

當中有些文字，雖然能與《本集》所記對應，但內容卻有很大的分別，如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後赤壁賦〉注引《志林》「李委吹笛」一則文字，便與《本集》不同。檢郎曄〈後赤壁賦〉注引《志林》曰：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日。李委秀才來，因以小舟載酒飲于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數弄，風起水湧，大魚皆出，山上有栖鶻，亦驚起。坐想孟德、公瑾，如昨日尔。³⁴

至於《本集》則曰：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東坡生日。置酒赤壁磯下，踞高峰，俯鶻巢。酒酣，笛聲起於江上。客有郭、古二生，頗知音，謂坡曰：「笛聲有新意，非俗工也。」使人問之，則進士李委，聞坡生日，作新曲曰〈鶴南飛〉以獻。呼之使前，則青巾紫裘腰笛而已。既奏新曲，又快作數弄，嘹然有穿雲裂石之聲。

³² 《大全集》已佚，惟從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頁502-3）「麻沙書坊又有《大全集》，兼載『志林』、『雜說』之類」一語來看，此書並沒有把《志林》的內容直接收錄在《本集》中，而是以雜錄的形式附載於後。

³³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1，頁3。《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十，頁十一至十二上有收錄，文字稍異。此段文字王十朋注《白水山佛迹巖》所引有刪略，詳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二，頁二三下。

³⁴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一，頁四上。按：呂祖謙《觀瀾集注》收錄此篇，也題「志林」；《苕溪漁隱叢話·後集》亦有收錄。詳見《東萊集註類編觀瀾文集》，甲集，卷四，頁十三上；胡仔（纂集）、廖德明（校點）：《苕溪漁隱叢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後集，卷26，頁191-92。

坐客皆引滿醉倒。委袖出嘉紙一幅，曰：「吾無求於公，得一絕句足矣。」坡笑而從之。³⁵

兩段文字都是記載元豐五年(1082)十二月十九日蘇軾生日，遊赤壁磯下聽李委吹笛一事，當中文字明顯詳略不同。兩則記載，絕非單純的增刪，而是敘說角度不同：《本集》所載的是事情的緣由與發展；而《志林》所記，則是蘇軾的感懷：「坐想孟德、公瑾，如昨日尔。」可見即使所記為同一事，《志林》與《本集》所錄文字的系統有別。³⁶

(二) 多為手稿題跋

這部「雜說」《志林》的內容，所以不見於兩宋蘇軾《本集》者，其中一個主要原因是當中不少文字並非完整的敘錄，而是以手稿、題跋的形式出現，如王十朋、施元之、顧景蕃注《東陽水樂亭》引「錢塘、東陽皆有水樂洞」一段文字，³⁷出自蘇軾跋法掾吳春所作的《石鐘山記》。此《記》末云：

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五日，自海南還，過南安，司法掾吳君示舊作《石鐘山記》，復書其末。³⁸

從「復書其末」四字可見此文蓋以題跋的形式敘說。又郎擘《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注《錢塘勤上人詩集叙》引《志林》「題文忠公送惠勤詩」，³⁹更明顯是蘇軾題於歐陽脩《送惠勤歸餘杭》詩後的文字，其末亦云：

又明年六月六日，偶至勤舍，出此詩，蓋公之真迹，讀之流涕，而勤請余題其後云。⁴⁰

當中，不少文字是蘇軾閱讀書籍時偶有所感而發，如《正月二十日，與潘郭二生出郊尋春，忽記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詩，乃和前韻》，王十朋注引《志林》「黃州東十五里有永安城而俗謂女王城」，⁴¹見於《志林》「黃州隋永安郡」：

³⁵ 王文誥(輯注)：《蘇軾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2年)，頁1136。

³⁶ 今本《蘇軾詩集》所載《李委吹笛引》以「東坡」、「坡」字自稱，似非蘇軾自撰之辭，或是編集者從他處移入。若以此觀之，則《志林》所載文字並不存在這種情況，很可能就是蘇軾原來的敘說。

³⁷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九，頁十七上：「《志林》：『錢塘東陽皆水樂洞，泉流空巖中，皆自然宮商。』」《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卷七，頁十五下：「《東坡志林》云：『錢塘東陽皆有水樂洞，泉流空巖中，自然宮商。』」

³⁸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四九，頁六上。

³⁹ 同上注，卷五六，頁八上至八下。

⁴⁰ 蘇軾(著)、屠友祥(校注)：《東坡題跋》(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頁129。

⁴¹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七，頁十二下。

昨日讀《隋書·地理志》，黃州乃永安郡。今黃州都十五里許有永安城，而俗謂之「女王城」，其說甚鄙野。而《圖經》以為春申君故城，亦非是。春申君所都，乃故吳國，今無錫惠山上有春申廟，庶幾是乎？⁴²

可見這則文字，便是源自蘇軾讀《隋書·地理志》時的判斷。另，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引《志林》「禁同省往來」，⁴³是蘇軾讀白居易的〈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詩後的感歎。《志林》云：

元祐元年，余為中書舍人，時執政患本省事多漏洩，欲於舍人廳後作露籬，禁同省往來。余曰：「諸公應須簡要清通，何必栽籬插棘！」諸公笑而止。明年，竟作之。暇日讀《樂天集》，有云：「西省北院，新構小亭，種竹開窗，東通騎省，與李常侍窗下飲酒作詩。」乃知唐時得西掖作窗以通東省，而今日本省不得往來，可歎也。⁴⁴

這類文字中，以施元之、顧景蕃注〈甘露寺〉引《志林》「廣武嘆」的內容最為完整：

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游甘露寺。寺有孔明、孫權、李德裕遺跡，感而賦詩，猶此意也。今日讀李太白〈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太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多故，故一放於酒，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⁴⁵

從「今日讀李太白〈廣武古戰場〉詩」云云，可見這段文字乃蘇軾讀李白詩時所記，但從內容上來看，這段文字緊密地連繫了三事：先是先友史經臣與蘇軾的一番對答，其後是蘇軾潤州甘露寺遺跡的賦詩，最後才是蘇軾讀李白詩的判斷。從蘇軾與史彥輔的對答以及詩句「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聊興廣武嘆，不得雍門彈」來看，⁴⁶蘇軾的這種判斷其實早已有之，而且一直存留心中。可見這部「雜說」《志林》的內容，不少是蘇軾思想的重要組成。

⁴²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4，頁74。《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五，頁九下有收錄，文字稍異。

⁴³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19冊據明天啟元年（1621）刻本影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年），頁三一上。

⁴⁴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2，頁30。《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一，頁三上有收錄，文字稍異。

⁴⁵ 《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卷四，頁七上至七下。此則五卷本、十二卷本均有收錄而文辭稍異。詳見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1，頁7；《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四，頁三下至四上。

⁴⁶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1，頁7。此段文字也見於《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四，頁三下至四上。

(三) 有待整理的文字

這些「手澤袋」中的文字，雖然都是蘇軾有意為之，但很多還未及好好整理，故當中偶有相類或語義重複的文字，如今十二卷本《志林》收錄了兩則「馬正卿」的文字，內容便非常相近：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清苦有氣節，學生既不喜，博士亦忌之。余偶至其齋中，書杜子美〈秋雨歎〉一篇壁上，初無意也，而正卿即日辭歸，不復出，至今白首窮餓，守節如故。正卿，字夢得。⁴⁷

又曰：

馬夢得與僕同歲月生，少僕八日。是歲生者，無富貴人，而僕與夢得為窮之冠。即吾二人而觀之，當推夢得為首。⁴⁸

這兩則資料，王十朋《東坡詩集注》在〈東坡八首·其八〉中有引錄，⁴⁹可見早已收錄在南宋年間的「雜說」《志林》。兩則文字都以記載馬正卿的窮苦為主，前一則主要敘述蘇軾與馬正卿的經歷，而後一則重在道出他與馬正卿所以「窮」的因由。值得注意的是，前一則以馬正卿呼之，在結尾時把馬正卿的字號道出，而後一則直接以字號呼之作馬夢得。考五卷本和十二卷本《志林》，名字冷僻者，多標名號，如「吾故人黎錞，字希聲」、⁵⁰「史經臣，字彥輔」；⁵¹蘇軾在第二則文字中直接稱呼字號而不提本名，似乎是有待把兩者併合起來論述。⁵²

⁴⁷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五，頁五上。此則文字王十朋注〈東坡八首·其八〉、施元之、顧景蕃注〈東坡八首〉(題「先生儋耳手澤」)皆有引錄，但文字有刪略。詳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四，頁六下；《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卷十九，頁一下。

⁴⁸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二，頁四上。此則文字五卷本也有收錄，詳見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1，頁21。

⁴⁹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四，頁六下，所引有刪略。

⁵⁰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1，頁5；《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六，頁六上。施元之、顧景蕃注解〈寄黎眉州〉引錄此條而題曰「東坡手澤」。詳見《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卷十一，頁十六上。

⁵¹ 十二卷本三則提及「史經臣」的文字，都標示其本名字號。詳見《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三，頁七下至八上；卷四，頁一下至二上、三上至四上。其中卷四，頁三上至四上「昔先友史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一則，也見於《施顧註蘇詩·甘露寺》及五卷本《志林》，詳見上文之論述。

⁵² 王十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以「又曰」標示，可推想兩則文字在原有的「雜說」《志林》中並沒有併合起來。又，此兩則文字十二卷本分別載於卷二，頁四上；卷五，頁五上。

張溥(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雲谷雜記》和佚名《歷代名賢確論》引錄《志林》「宰我與田常作亂」的文字頗值得留意。檢十二卷本《志林》卷三有兩則講述宰我與田常作亂的文字，第一則曰：

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明甚。太史公固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載，而吾先師與蒙其誣，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⁵³

第二則曰：

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耻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⁵⁴

兩則文字均為宰我平反，前一則記蘇軾令兒子蘇邁考閱舊書，得宰我不叛之證，以辨《史記》之誤；下則以李斯之言論宰我因不從田常作亂而遭滅族。張溥《雲谷雜記》合之，謂：

《東坡志林》曰：「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弟子傳〉乃云：『宰予與田常作亂。』(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知其實，〈弟子傳〉妄也。)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於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近令兒子邁考閱舊書，究其所因，則宰我不叛，其驗甚明。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有冤千載，而吾先師蒙其誣，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⁵⁵

《歷代名賢確論》雖然亦把兩段文字整合，但以「常病太史公言」一段為首：

東坡曰：「常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焉，而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豈非千載不蠲之惑也耶？近令邁考閱經書，究其所自，則宰我不叛，尤驗明甚。太史公因陋承疑，使宰我負冤千歲，而吾先師與蒙其垢，自茲一洗，亦古今之快也。李斯上書諫二世，其略曰：『田常為簡公臣，布德施惠，下得百姓，上得羣臣，陰取齊國，殺宰予

⁵³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三，頁二上至二下。

⁵⁴ 同上注，頁八上。

⁵⁵ 張溥(撰)、張宗祥(校錄)：《雲谷雜記》(北京：中華書局，1958年)，頁82-83。

於庭。』是宰我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而〈弟子傳〉乃云：『宰我與田常作亂而滅其族，孔子恥之。』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遠，宜得其實，〈弟子傳〉妄也。』⁵⁶

從文章用意來看，張淏《雲谷雜記》、佚名《歷代名賢確論》兩種排序均無不可，語意皆通，但從敘述角度來看，宜先陳述事情，再道明理據，最後才結以感懷，故以張淏《雲谷雜記》的次序為宜。但更值得留心的是，宋人已經看到這部「雜說」《志林》的內容存在整合的傾向。這兩則文字都收錄在今天所見十二卷本的卷三，很可能便是因為內容相近而放在一起，甚或可視作蘇軾整理中的旁證。蘇過謂蘇軾「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按道理蘇軾決不會只埋首整理十三篇史論，故理應還有很多零碎、未經整合、修飾的材料。這些文字，很有可能就殘留在这部「雜說」《志林》中。

由是，今天所見「雜說」《志林》中有不少三言兩語的文字，如「李獻之遺予天台玉版，殆過澄心堂，頃所未見」；⁵⁷「月石屏捫之，曰微凸，乃偽也，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可寶」。⁵⁸ 這些內容雖然都很簡單，甚至未必有很實在的意義，但很有可能是蘇軾完成百篇《志林》的重要材料。⁵⁹

四、五卷本與十二卷本的成書及其與「雜說」《志林》的關係

從宋、元書籍引錄的情況來看，「雜說」《志林》頗受當時文人關注。就筆者整理的資料中，除南宋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嘗引錄外，其他的引錄者多達21家24種資料，⁶⁰ 而龔明之更欲效其文而成「志林體」，那究竟五卷本和十二卷本是何時出現？它們的關係又是如何？

⁵⁶ 佚名：《歷代名賢確論》，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7冊，卷二六，頁十四下至十五上。

⁵⁷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十二，頁三上。王十朋注〈孫莘老寄墨四首〉引此條而文字稍異，詳見《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二，頁十九上。

⁵⁸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十二，頁三上。王十朋注〈軾近以月石硯屏獻子功中書，公復以涵星硯獻純父侍講，子功有詩，純父未也，復以月石風林屏贈之，謹和子功詩，并求純父數句〉引此條而文字稍異，詳《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二，頁二四上。

⁵⁹ 元符三年（1100），蘇軾在海南遇赦，北歸過廉州，嘗寄書予鄭靖老，提及《志林》的撰作背景：「《志林》竟未成，但草得《書傳》十三卷，甚賴公兩借書籍檢閱也。」見蘇軾：〈與鄭靖老四首〉，載孔凡禮（點校）：《蘇軾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頁1675。可見蘇軾十分重視《志林》，並不願輕易湊雜成篇，惜只完成十三篇便歿世。

⁶⁰ 詳見附錄「宋、元文獻徵引『雜說』《志林》內容」。佚名《南溪筆錄群賢詩話》所載與高楚芳《集千家注杜詩》的內容非常接近，兩者可能有傳承關係；另，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一) 五卷本與十二卷本的成書背景

五卷本《志林》以萬曆二十三年(1595)趙開美的刊本為最早，卷首載其父趙用賢的〈刻東坡先生志林小序〉：「余友湯君雲孫博學好古，其文詞甚類長公，嘗手錄是編，刻未竟而會病卒。余子開美因拾其遺，復梓而卒其業，且為校定訛謬，得數百言。庶幾湯君之志不孤，而坡翁之在當時其趨趨於世途、鞿縛於窮愁者，亦略可見云。」⁶¹可見此書原為湯雲孫手錄；湯雲孫去世後，由趙開美校訂刊成。

雖然在〈序〉中我們無法確定湯、趙二人實際上如何編訂此書，但就今天所見，二十九門的分類應該是這部「志林」所創，這點可以在趙用賢所撰的〈序〉中窺見一二：「東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紀元祐、紹聖二十年中所身歷事，其間或名臣勳業，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僊伎術，片語單詞，諧謔縱浪，無不畢具。」⁶²當中「名臣勳業，或治朝政教，或地里方域，或夢幻幽怪，或神僊伎術」之語大可與這部「志林」的人物、懷古、論古、夷狄、記遊、古迹、夢寐、異事、技術的分類一一對應。

當然，二十九門的分類的確為讀者帶來很多便捷，也是此本流傳較廣的原因；但是這樣的分類很有可能會出現一些未能歸類的文字，如上文所引王十朋《東坡詩集注》引《志林》「月石屏真者必平」，⁶³便無法歸入此二十九類。另一方面，分類後一些內容相近的文字或因此遭到刪去，如上文所引「馬正卿」兩則內容相近的文字，五卷本便只收錄論述比較詳細的一則。

除有刪削之嫌，五卷本還很有可能因遷就體例、⁶⁴篇幅而摻雜的文字，章培恒、徐艷在〈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一文，曾提出此書有些文字並非出於蘇軾，有的雖出於蘇軾，但不出於《志林》，惟其所舉五例尚有斟酌處，不若「記告訐事」、「記講筵」兩則文字明確。⁶⁵此兩則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都有收錄，均題《東

〔上接頁39〕

司農司《農桑輯要》、王禎《王禎農書》所引《志林》「竹有雌雄」一則文字，很有可能轉引自吳櫟的《種藝必用》。倘若去除這些有傳承關係的典籍，宋元文獻稱引《志林》的，也達17家20種。

⁶¹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序〉，頁1。

⁶² 同上注。

⁶³ 詳《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二，頁二四上。

⁶⁴ 就體例而論，五卷本前四卷為筆記式散論，第五卷為體例嚴謹的史論，無論是從文風、篇幅抑或類型而言，都不是很統一的狀況。

⁶⁵ 按：此則宋佚名《翰苑新書集》亦題《東坡集》。此兩則均不見於十二卷本《志林》。詳見《新編翰苑新書》，《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74冊據明抄本影印(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年)，前集，卷九，頁六下至七上。

坡集》。⁶⁶ 朱熹去蘇軾不遠，按理所見《本集》與《志林》都非常接近其原先的狀況，《五朝名臣言行錄》亦五次引用《志林》一書，可見這兩則文字早已收錄在南宋的《本集》中，故摻雜的可能性很高。⁶⁷

至於十二卷本的《志林》，現存最早的為明萬曆商濬《稗海》所收，此書並無序跋，故無法得知其成書背景，加上內容看上去比較「蕪雜」，⁶⁸ 體例不及五卷本完善，故向不為世所重，夏敬觀在《東坡志林跋》便云：「疑商刻《志林》為明時好事者所為，其與《言行錄》合者，以其哀錄之廣耳。」⁶⁹

⁶⁶ 朱熹：《三朝名臣言行錄》，《四部叢刊初編》影印海鹽張氏涉園藏宋本（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日期不詳），卷10，總頁240—41；卷11，總頁272。

⁶⁷ 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一文在「有的雖出於蘇軾，但不出於《志林》」的論述時，舉「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勃遜之」兩則文字作證。章、徐指「記劉夢得有詩記羅浮山」，取自蘇軾詩〈遊羅浮山一首示兒子過〉的自注；「勃遜之」，則取自〈贈朱遜之〉詩的〈引〉。詳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頁168—69。本文在第二節「『雜說』《志林》的內容」中嘗提出「雜說」《志林》中有不少文字實乃蘇軾的題跋注釋，很多並非完整的敘錄，王十朋、施元之、顧景蕃注〈東陽水樂亭〉所引「錢塘、東陽皆有水樂洞」，郎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所引〈李委吹笛〉都是這樣，故此兩則文字未能作實證。另外，章培恒、徐艷之文還提出「有些文字並非出於蘇軾」的觀點。章、徐主要以「梁上君子」、「太白山舊封公爵」、「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三則文字作據。詳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頁169—71。安苒璿〈宋人筆記研究〉（頁84—85）已詳細分析「梁上君子」、「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兩則文字「肯定是蘇軾的手筆」。安苒璿謂「梁上君子」的「魏王」見於蘇軾的〈論魏王在殯乞罷秋燕筍子〉，「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早已在元代劉壘《隱居通議》中引用過。其說有理，在此不作贅言。至於「太白山舊封公爵」，章、徐二人認為與蘇軾〈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一文大相徑庭，又認為當中的內容有嚴重衝突。見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頁170。本文在討論〈李委吹笛〉一文時已指出即使所記為同一事，《志林》與《本集》收錄文字的系統有別，故亦不能作據；至於內容的衝突，很有可能是因為兩篇文章的立意不同。〈奏乞封太白山神狀〉為蘇軾代當地太守所作，宋本《東坡集》有「為太守宋選作」的旁注，內容不宜不敬，且有需要從太守的角度敘說。由是，「太白山舊封公爵」中提及蘇軾個人的建言，到了〈奏乞封太白山神狀〉中便成了「臣采之道塗，得於父老」之說，這也是很合情理。至於章、徐二人提及王宗稷《年譜》所記為「論太白山舊封公爵」，而《志林》「太白山舊封公爵」欠缺「論」的元素。若細看「太白山舊封公爵」文辭，亦非僅記事，亦論及「神之所以不悅者」為何事，又以《唐會要》為證，且謂「吾作奏檢具言其狀，詔封明應公」者，亦具論的陳說。況「雜說」《志林》本身並不設標題，王宗稷《年譜》所引只是存其意，如其引《志林》「論子厚瓶賦」，亦只是存其意而非該文的標題或文字。故此則文字亦未能作實證。〈奏乞封太白山神狀〉見《東坡集》，收入《東坡七集》，卷三四，頁三上至三下；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頁八下。「論子厚瓶賦」見《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九，頁八上；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頁三七下。

⁶⁸ 王松齡語，見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點校說明〉，頁3。

⁶⁹ 涵芬樓本《東坡志林》（五卷本），跋，頁一下。

此本收錄文字較五卷本多，五卷本《志林》收錄202則文字，十二卷本《志林》有363則，其中151則互見。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南宋年間蘇軾年譜、詩文注釋、宋元文獻所存的「志林」內容，抑明代一百卷本《說郛》所錄的《東坡手澤》，十二卷本都較五卷本保存更多「雜說」《志林》的文字。惟學界對這種現象的判斷，大多認為是此本編者「有意」輯錄的緣故，章培恒、徐艷謂：「其較五卷本多出的部分，有些當出於輯佚，如陶宗儀《說郛》所引《東坡手澤》十五條，五卷本只收了八條，十二卷本《志林》則將其遺漏的七條中六條都收入了（但還遺漏了一條），當即輯自《說郛》。朱熹《名臣言行錄》所引五條，五卷本只收了兩條，十二卷本也收全了，也當自《名臣言行錄》出。」又謂：「十二卷本《志林》，不僅出於五卷本《志林》之後，且將五卷本中除『論』的一卷外的絕大多數文章收入，包括上文提到的那些並非出於《志林》的摻入之作，以及出於後人的偽作。可見也是一部真偽雜糅的書。」⁷⁰ 即安苋璿在整理南宋年間蘇軾年譜、詩文注釋所引《志林》的內容後，⁷¹ 雖然得出「十二卷收錄得更加全面」的結論，但最後仍然認為五卷本「從真實性考慮則較為可靠」、十二卷本「有偽作的嫌疑」的判斷。⁷² 這種看法，或多或少受《稗海》成書晚於趙開美五卷本的背景影響，而學界亦忽略了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中關於十二卷本《東坡志林》的一段文字。《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六著錄「《東坡志林》十二卷（舊鈔本）」，云：

宋蘇軾撰。《直齋書錄》載《東坡手澤》三卷，即此書也。是本不著何人編輯，較趙氏、毛氏刻本為多，編次亦異。曾氏《類說》中有東坡《仇池筆記》一種，亦併入焉。但字句異同，往往而有。舊為崑山張石川氏藏書，葉白泉主政得之，校勘數過。白泉名國華，文莊後人也。後有跋云：「此石川先生所藏書也，題籤猶其手蹟，偶從肆中得之，書以識歲月。丙辰冬日菴竹堂。」又

⁷⁰ 章培恒、徐艷：〈關於五卷本《東坡志林》的真偽問題〉，頁173。

⁷¹ 安苋璿：〈宋人筆記研究〉，頁92-94。安苋璿整理《施顧註蘇詩》蓋依《四庫全書》本。惟《四庫》本經後人整理刪改，非原貌。本文所據為鄭騫、嚴一萍（編校）《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其中有三則文字：「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卷六，頁二三下；卷二八，頁八下）、「百年未滿不得死」（卷三五，頁二十上）、「揚州芍藥為天下冠」（卷三六，頁十六上）《四庫》本沒有收錄；另文淵閣《四庫》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有六則文字：「鵝能警盜」（卷十六，頁四下）、「黃州隋永安郡」（卷十八，頁二八上）、「記樊山」（卷二十，頁二六上）、「賣墨者潘谷」（卷二二，頁四下）、「桃竹葉如棕，身如竹」（卷十五，頁十二上）、「遊白水書付過」（卷三五，頁十五上至十五下），不見於《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

⁷² 安苋璿：〈宋人筆記研究〉，頁92-95。安文舉了三個證據：「爛蒸同州羔」、「自蘇子美死」、「作字要手熟」。關於「自蘇子美死」、「作字要手熟」兩則文字，下文將有詳細的分析，在此不贅。至於「爛蒸同州羔」一則文字，宋朱弁《曲洧舊聞》（上海：上海進步書局，出版日期不詳），卷五，頁三上：「東坡與客論食次，取紙一幅，書以示客。」可見蘇軾確曾書此一段文字。而這與上文討論手澤袋中的情況非常相類，未必是後人摻雜之作。

云：「……《志林》二冊，為張石川先生舊藏，謬誤不少，再三較完，故識之簡端。」⁷³

從這段文字可見，十二卷本的系統除《稗海》本外，還曾經存有「鈔本」。據瞿鏞所言，這部「鈔本」曾為崑山張石川收藏，且存其題籤手蹟。張石川即張寰（1468–1561），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曾任刑部員外郎、通政參議，築崇古樓，聚書甚富。⁷⁴故這部「鈔本」的時代，明顯比趙開美刊行的五卷本（1595）要早。也就是說，在文獻上，十二卷本《東坡志林》系統的記錄，早於五卷本。

（二）五卷本與十二卷本的關係

至於五卷本與十二卷本的關係，目前的研究只停留在推測的層面，未有提出確切的證據，畢竟這兩個系統雖然有不少相同的內容，相異的地方也很多。如果我們逐一比對這兩個版本，便會發現它們的關係其實非常密切。最明顯的例子是「書贈惠誠」（五卷本題「付僧惠誠游吳中代書十二」）的十二則文字。⁷⁵此十二則文字，雖然偶有他書引錄，但如此相同的文字和序列次序，只見於五卷本、十二卷本《志林》。

另一方面，兩本收錄的異文也非常接近，如施元之、顧景蕃注〈蔡景繁官舍小閣〉云：

元豐七年至日，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方行部。既賦此詩，且以帖與景繁云：西閣詩不敢不作，然未敢便寫板上。閣名亦思之，未有佳者。蔡謨、蔡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比公家，不知可否？⁷⁶

兩本「志林」所載文字略異，五卷本《志林》（涵芬樓本）云：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軾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家，不知可否？⁷⁷

十二卷本《志林》云：

⁷³ 瞿鏞（編纂）、瞿果行（標點）、瞿鳳起（覆校）：《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頁419。

⁷⁴ 丁輝、陳心蓉：《中國進士藏書家考略》（合肥：黃山書社，2017年），頁87。

⁷⁵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2，頁40–41；《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十一，頁五下至八上。

⁷⁶ 《增補足本施顧註蘇詩》，卷二二，頁十二下至十三上。

⁷⁷ 《東坡志林》（涵芬樓本），卷四，頁三下。

元豐三年冬至，過山陽，登西閣，時景繁出巡未歸。某方乞歸常州，得請，春中方當復過此。故有閣欲名，思之未有佳者。蔡謨、廓，名父子也，晉宋間第一流，輒以仰公名，不知可否？⁷⁸

五卷本與十二卷本所載的這些異文都未見於他本，尤其是元豐七年與元豐三年之別，也僅見於這兩本的「志林」，可見五卷本與十二卷本這兩個系統在文字上也存有很多的聯繫。以這樣的情況來看，它們之間的關係存有三種可能：一、兩本有一共同的祖本；二、五卷本因承十二卷本；三、十二卷本因承五卷本。

三者中，以第三種的可能最低，理由有二：一、若十二卷本的編者真的「有意」輯佚，即不論其成書是否先於五卷本的系統，《說郛》所載十五則文字，缺收一則這點尚且可說，但何以一些較易處理的資料如南宋年間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的引錄，此系統卻未有好好把握？相反一些看起來不大為人關注的宋、元別集如蘇象先（元祐六年〔1091〕進士）《譚訓》、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淳熙八年〔1181〕原刻）、張湜（紹興二十七年〔1157〕進士）《雲谷雜記》、樓鑰（1137–1213）《范文正公年譜》、王若虛（1174–1243）《滹南遺老集》所載，此本卻是沒有任何遺漏；⁷⁹ 二、就我們所見，今天十二卷本的內容是比較雜亂的，也就是未有很系統地作整理，如是，這位編者整理的時候應是很隨意，但就上文所舉的宋、元文獻的內容，以至五卷本所收錄的文字，卻是散見於十二卷本的各卷，這除了刻意造假的這一可能外，似乎就沒有其他原委了。⁸⁰ 所以這兩個系統的關係，只有共同祖本與五卷本因承十二卷本這兩種可能。

（三）十二卷本所保存「雜說」《志林》的面貌及其價值

要釐清五卷本與十二卷本的關係，我們需要重新審視十二卷本的內容與其體例。當然，從南宋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所引「志林」的內容來看，十二卷本與南宋年間王宗稷等人所見的「雜說」《志林》仍有一些距離，但若然我們以其他宋、元文獻所徵引的《志林》內容考察，五卷本缺收28則，十二卷本只缺收「記道人問真」、「記承天寺夜遊」、「李委吹笛」、「題文忠公送惠勤詩」4則文字，⁸¹ 若然我們再考慮當中可能轉

⁷⁸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七，頁五上。

⁷⁹ 詳見附錄「宋、元文獻徵引『雜說』《志林》內容」。

⁸⁰ 固然，在後人刊行中或會出現「位移」的狀況，但若然我們考慮到南宋文獻所整合的「雜說」《志林》的內容（詳見下節的討論），都能在十二卷本中找到證據這一點來看，這種可能性也是相對比較低的。

⁸¹ 宋元類書如佚名《錦繡萬花谷》、祝穆《事文類聚》、謝維新《事類備要》、陰時夫《韻府群玉》等雖多列有「志林」條目，惟就其所記，絕大部分並非今天所能辨別的《志林》內容，疑其把收錄的蘇軾雜說類文字都一併稱之為「志林」之故。

引幾部蘇軾年譜、詩文注釋的情況，那實際上就只有方嶽(1199–1262)《深雪偶談》「記承天寺夜遊」1則文字未見於十二卷本中，即加上陶宗儀一百卷本《說郛》所收的15則《手澤》文字作比對，五卷本缺收35則，十二卷本只缺收2則。其他文獻如張淏《雲谷雜記》、樓鑰《范文正公年譜》、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吳炯(?–1154)《五總志》、王象之(1163–1230)《輿地紀勝》等所引的「志林」內容，均能見於十二卷本中。⁸²

以這種狀況來看，十二卷本所載，又與宋、元文人所見的可謂非常接近。當中尤值得注意的是高楚芳(1255–1308)《集千家注杜詩》，此書徵引「志林」14則，在這14則資料中，有13則內容並未見其他文獻引錄，而這14則資料，全部都能夠在十二卷本《志林》中找到。若我們把目光擴到整個元代，便會發現元代曾引錄「志林」資料的，如王若虛(1174–1243)《滹南遺老集》、劉壘(1240–1319)《隱居通議》、羅璧(1244–1309)《識遺》、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佚名《南溪筆錄群賢詩話》，所徵引的內容都無出十二卷本。這斷非純粹巧合。當然，我們也可認為這是十二卷本編者有意在這些資料中輯錄整理，但誠如上文所論，這位編者竟置幾部蘇軾重要的年譜、詩文注釋於不顧，而著手處理這些徵引數量不多的文集，更刻意把這些資料打亂，散落各卷帙，這樣的舉動也太不合乎常理。所以就這樣的情況來看，十二卷本的內容及其規模，很有可能早在元代甚或更早以前已經出現。

1. 文辭有待整合

在體例上，十二卷本並沒有五卷本那樣明確分門別類，但它的內容絕非「蕪雜」。我們以五卷本的分類作比對，便會發現兩書有不少序列是相同的，如五卷本卷一的文字大多見於十二卷本的卷十(10則)；卷二的文字大多見於十二卷本的卷十一(13則)；卷三的文字大多見於十二卷本的卷五(12則)；卷四的文字大多見於十二卷本的卷二(7則)和卷三(7則)，故無論五卷本與十二卷本是有共同祖本抑或五卷本因承自十二卷本，它的分類似乎都並非全然是湯雲孫與趙開美兩人的主意，而是在他們所看見的資料中，本身就存在一些聯繫，如五卷本卷一「夢寐」之「夢中論左傳」、「夢中作靴銘」和「記夢」的第一則，都是並列於十二卷本的卷七；⁸³又卷四「人物」所載「顏蠟巧於安貧」、「李邦直言周瑜」、「勃遜之」、「邳超出與桓溫密謀書以解父」、「劉凝之沈麟士」、「柳宗元敢為誕妄」等，都是置於十二卷本卷二的位置。⁸⁴同樣的情況也可以見於《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七「雜說」部分。《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收錄蘇軾

⁸² 詳見附錄「宋、元文獻徵引『雜說』《志林》內容」。

⁸³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1，頁17–19；《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七，頁二上至二下。

⁸⁴ 王松齡(點校)《東坡志林》(五卷本)，卷4，頁86–94；《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二，頁二上至八下。

20則論說的文字，當中見於十二卷本有14則，而其中9則文字都是在卷三中，⁸⁵可見十二卷本《志林》的序列還是有相當的聯繫。如果我們把這種情況與黃庭堅〈跋東坡敘英皇事帖〉所言「手澤袋蓋二十餘，皆平生作字，語意類小人不欲聞者，輒付諸郎入袋中，死而後可出示人者也」併合起來看的話，這些看似雜亂的序列也許保存了手澤袋中原始的分類。

另一方面，十二卷本所收錄的文字，雖然都是獨立成篇，但有不少零碎的語言，如上文所舉王十朋《東坡詩集注》引「李獻之遺予天台玉板紙，殆未見」，⁸⁶「月石屏真者必平，然多不圓。圓而平，桂滿而不出者，此至難得也」，⁸⁷都是較難看見其中的用意。但十二卷所載的這些文字，有的在前人看來已有整合的可能，除上文所引張湜《雲谷雜記》和佚名《歷代名賢確論》「田常作亂」的兩則文字，《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七「論管仲說」，還收錄一則整合十二卷本「志林」兩則文字的文章。檢十二卷本《志林》卷三曰：

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臺，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⁸⁸

又曰：

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循誅死，有以也夫。⁸⁹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十七整合兩則文字而題曰「論管仲說」：

⁸⁵ 此九則為「論管仲說」、「褚遂良對太宗飛雉說」、「辯蜡祭說」、「辯堯舜說」、「辯幸我說」、「直不疑蒙垢以求名說」、「辯揚雄說」、「辯四凶說」、「商君說」。詳見《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三。

⁸⁶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十二，頁十九上。

⁸⁷ 同上注，頁二四上。

⁸⁸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三，頁一上至一下。

⁸⁹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而民非之，無忠臣以掩其過也。子罕釋相而爲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爲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爲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謂其有禮也。而管仲之後不復見於齊者。余讀其書，大抵以魚鹽富齊耳。余然後知管子所以無後於齊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如其仁。」夫以孔子稱其仁，左丘明稱其有禮，然不救其無後，利不可與民爭也如此。桑弘羊滅族，韋堅、王鉷、楊慎矜、王涯之徒，皆不免於禍，孔謙誅死，有以也夫。⁹⁰

這兩則文字，「宋君奪民時以爲臺」至「管仲之器小哉」，見於宋呂祖謙的《宋文鑒》和佚名《歷代名賢確論》；⁹¹「左氏云：『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至「孔謙誅死，有以也夫」，見於章如愚（慶元二年〔1196〕進士）《群書考索》（題「過斂者多不克終」）和《歷代名賢確論》（題「管仲無後」）。⁹²可見兩則文字在流傳過程中大多分別序錄，《經進東坡文集事略》把它們整合起來作「論管仲說」，除與「雜說」《志林》不設標題有關，很可能是郎曄看見這兩則文字本身就是放在一起的緣故。這兩則文字今見於十二卷本的卷三，中間只隔了「善用兵者，破敵國當如小兒毀齒」一則文字，⁹³可見在十二卷本中，前後相鄰的內容，除了類別相近外，還存在整合的可能。

後人往往因為不了解十二卷本的這種狀態而誤讀此書。安苜璿在〈宋人筆記研究〉一文中曾以十二卷本所載「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一則文字，乃出自歐陽脩的《筆錄》而判斷此書確實有「真偽混淆」的部分。⁹⁴然而，如果我們把「自蘇子美死」一則與上一則文字併在一起，便能理解當中的狀態。十二卷本卷九第四則：

歐陽文忠公論書云：「蔡君謨獨步當世。」此為至言。君謨行書第一，小楷第二，草書第三。就其所長而求其所短，大字為少疎也。天資既高，又輔以篤學，其獨步當世宜哉。近歲論君謨書者，頗有異論，故特為明之。⁹⁵

⁹⁰ 《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頁十二上至十三上。

⁹¹ 《宋文鑒》，頁1491；《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八，頁四下至五上。

⁹² 章如愚：《群書考索》，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936冊，卷二十，頁八下至九上；《歷代名賢確論》，卷十八，頁十四下至十五上。

⁹³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三，頁一下。

⁹⁴ 安苜璿：〈宋人筆記研究〉，頁87。

⁹⁵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九，頁一下。

第五則曰：

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如何哉？⁹⁶

上則文字記歐陽文忠公論書，謂其曾言「蔡君謨獨步當世」，蘇軾認為這是「至言」，又謂近歲論蔡君謨者，頗有異議，故特書以明之。在這則文字中，我們只能看見歐陽脩的判語，並沒有此句話的背景，而這正正是下一則文字的補充。這則文字向為人誤解，明末七十五卷《東坡先生全集》始收錄之，⁹⁷ 自後孔凡禮《蘇軾文集》、⁹⁸ 李之亮《蘇軾文集編年箋注》等均從此誤。⁹⁹ 清平步青(1832–1896)《霞外攬屑》曾提出這則文字只是輯錄，應與上一則文字合起來讀，其言為是：

稗海本《東坡志林》卷九云：「自蘇子美死，遂覺筆法中絕。近年蔡君謨獨步當世，往往謙讓，不肯主盟。往年予嘗戲謂君謨云：『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船不離處所。』君謨頗諾，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覺何如哉？」近刻《東坡全集》，標題作「記與君謨論書」，字句小異：「船不離處所」，作「不離舊處」；「二十餘年」，作「四十餘年」；「覺何如哉」，作「竟何如哉」。庸按《歐陽文忠全集》卷一百三十〈試筆〉云：「往年予嘗戲謂君謨：『學書如泝急流，用盡氣力，不離故處。』君謨頗笑，以為能取譬。今思此語，已二十餘年，竟何如哉？」《志林》出後人依託。此上一條首云「歐陽文忠論書云」，蓋即錄〈試筆〉。《志林》本不誤，《全集》不察，誤收之。……王文誥《蘇文忠公詩編注集成》總案卷一，嘉祐二年，時蔡襄以善書名天下，亦引公為重。小注即引此記，而云此記作於嶺外，而與君謨始遇於都門，當在此時，亦未考《歐集》也。¹⁰⁰

昔蘇軾「初欲作《志林》百篇，才就十三篇而先生病」，按道理蘇軾整理資料的過程中，應保存了不少像這樣零碎、未經整合、修飾的材料。元劉壘《隱居通議》所引《志林》「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也是這種狀態：

王彭嘗云：「塗巷中小兒薄劣，其家所厭苦，輒與錢，令聚坐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劉玄德敗，顰蹙有出涕者；聞曹操敗，即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

⁹⁶ 同上注，頁一下至二上。

⁹⁷ 蘇軾(撰)、陳明卿(訂正)：《東坡先生全集》，文盛堂刊清印本，卷六九，頁十一下。

⁹⁸ 《蘇軾文集》，頁2193。

⁹⁹ 李之亮：《蘇軾文集編年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11年)，第9冊，頁535–36。

¹⁰⁰ 平步青：《霞外攬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頁464。

人之澤，百世不斬。」彭，愷之子，為武吏，頗知文章，余嘗為作哀辭，字大年。¹⁰¹

如果我們撇除結尾純粹資料的說明，這段說話也全然是王彭所說，只是蘇軾覺其有理，故記之。由是，我們審視這部十二卷本《志林》的時候，理應仔細辨明前後文字的聯繫，否則便無法釐清當中的涵義。

2. 內容有別於《本集》

十二卷本所載，很多並不見於蘇軾的《本集》，但與上文所引「李委吹笛」的一段文字相類，有不少能與《本集》內容相對應的文字，或可作《本集》的重要注解，如《本集》有〈答畢仲舉二首（黃州）〉：

軾啟。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遠枉手教，存問甚厚，且審比來起居住勝，感慰不可言。……偶讀《戰國策》，見處士顏蠋之語「晚食以當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謂巧於居貧者也。菜羹菽黍，差饑而食，其味與八珍等；而既飽之餘，芻豢滿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惡在我，何與於物。所云讀佛書及合藥救人二事，以為閒居之賜甚厚。佛書舊亦嘗看，但闇塞不能通其妙，獨時取其粗淺假說以自洗濯，若農夫之去草，旋去旋生，雖若無益，然終愈於不去也。若世之君子，所謂超然玄悟者，僕不識也。往時陳述古好論禪，自以為至矣，而鄙僕所言為淺陋。僕嘗語述古，公之所談，譬之飲食龍肉也，而僕之所學，猪肉也，豬之與龍，則有間矣，然公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僕輩俯仰也？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來書云，處世得安穩無病，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三復斯言，感嘆無窮。世人所作，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刑殺無罪，取非其有，然後為冤業也。無緣面論，以當一笑而已。¹⁰²

畢仲舉，宋初宰相畢士安（938–1005）之曾孫，從文中「奉別忽十餘年，愚瞽頓仆，不復自比於朋友，不謂故人尚爾記錄」一語，可見二人的交情不至太深。此文主要回應畢仲舉勸其讀佛書一事，並以顏蠋之「晚食以當肉」和與陳述古論佛二事作解。就

¹⁰¹ 劉堦：《隱居通議》（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影印清康熙丁未〔1667〕序海山仙館叢書刊本），卷二五，頁六上至六下。此則也見於《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六，頁九下至十上），而文字略異。

¹⁰² 《蘇軾文集》，頁1671–72。

這篇文章來看，蘇軾所引顏蠋之「晚食以當肉」，目的是回應畢仲舉「粗衣飽飯，不造冤業，乃為至足」的行徑，並且與陳述古「終日說龍肉，不如僕之食猪肉實美而真飽也」相呼應。就文意而言，蘇軾在此頗贊同顏蠋之「巧於處窮」的表現，並藉此給畢仲舉予以認同，但若然我們把十二卷本「志林」所載顏蠋之的論述一併拿來看，便會有另一番感悟：

顏蠋與齊王遊，食必大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辭去，曰：「玉生於山，制則破焉，非不寶貴也，然而大璞不完。士生於鄙野，推遷則祿焉，非不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蠋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靜真正以自娛。」嗟乎！戰國之士未有如魯連、顏蠋之賢者也，然而未聞道也。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是猶有意於肉與車也。晚食自美，安步自適，取其美與適足矣，何以當肉與車為哉！雖然，蠋可謂巧於居貧者也。未饑而食，雖八珍猶草木也；使草木如八珍，唯晚食為然。蠋固巧矣，然非我之久於貧，不能知蠋之巧也。¹⁰³

蘇軾在《志林》中雖認同顏蠋之「巧於處窮」，但卻認為顏氏是「未聞道也」。因為顏蠋心中仍存留肉與車的概念，故非得道之人。如果我們以這種角度回看蘇軾對畢仲舉的質疑：「不知君所得於佛書者果何耶？為出生死、超三乘，遂作佛乎？抑尚與仆輩俯仰也？」便更能釐清當中文意，這也是文中蘇軾直言自疑學佛的本心所在：「學佛老者，本期於靜而達，靜似懶，達似放，學者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所似，不為無害。僕常以此自疑，故亦以為獻。」當然，若考慮到二人交情不深這點，蘇軾如此隱晦也是人之常情。

另一方面，十二卷本收錄的異文，亦有助校離今本蘇軾《本集》。孔凡禮《蘇軾文集》、李之亮《蘇軾全集》在整理蘇軾《本集》的時候也多有運用，但就其校語所見，似乎都偏重於五卷本，例如異文同出於五卷本與十二卷本者，多標趙刻《志林》（即五卷本）。¹⁰⁴ 惟若然我們考慮這兩本的成書背景，更應標示十二卷本為宜，如〈管幼安賢於荀孔〉一文，十二卷本便錄有不少異文。〈管幼安賢於荀孔〉，《外集》卷三十七收錄此文，題作「書管幼安傳」：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荀文若盛名，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謀殺，程昱、郭嘉之流，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踈，每所論建，輒中操意，況肯為用，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能駕馭卿。」夫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尔者，自知其陰賊險狠，

¹⁰³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二，頁六上至六下。

¹⁰⁴ 《蘇軾文集》、《蘇軾全集》於卷七十二「雜記」的校語均依此例。

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就閑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箭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元豐三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雪堂，面仆壁上，睡久驚覺，已三更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視之，則〈管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¹⁰⁵

十二卷本《志林》卷十二：

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自文若盛德，猶為之經營謀慮，一旦小異，便為所殺，程昱、郭嘉之流，固不足數也。孔文舉奇逸博聞，志大而才疎，每所建，輒中操病，況肯為用乎？然終亦不免。桓溫謂孟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即溫之才，百倍於嘉，所以云爾者，自知其陰賊險狠，不為高人勝士所比數爾。管幼安懷寶遯世，龍蟠海表，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箭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乎！余以謂賢於文若、文舉遠矣。紹聖二年十二月，與客飲，醉甚，歸坐雕堂西閣，面仆案上，睡久之忽驚覺，已三鼓矣。殘燭耿然，偶取一冊書，視之，則〈幼安傳〉也。會有所感，不覺書此，眼花手軟，不復成字。¹⁰⁶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於紹聖二年記蘇軾著作，中有〈讀管幼安傳〉，可證此文作於是年。¹⁰⁷又，蘇軾「雪堂」建成在元豐五年，〈江城子引〉謂「元豐壬戌（五年）之春，余躬耕於東坡，築雪堂居之。」¹⁰⁸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亦記：「元豐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皋亭，就東坡築雪堂，自號東坡居士。」¹⁰⁹故《東坡外集》「元豐三年歸坐雪堂」於理不合。即就文辭，各本作「文若盛名」，不及《志林》作「文若盛德」為妙。「盛名」指的是名聲，而「盛德」指的是德行。考上文「曹操既得志，士人靡然歸之」，指的是流俗之士趨而赴之，如是，若只強調荀文若的名聲，並未能突顯兩者的對比，而作「盛德」則能強調其才德，並反襯下句「猶為之經營謀慮」。至於「就閑海表」一語，也不及「龍蟠海表」傳神。「就閑海表」只是重申「懷寶遯世」之

¹⁰⁵ 蘇軾（撰）、毛九苞（編）：《重編東坡先生外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第11冊據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康丕揚維揚府署刻本影印（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卷三七，頁二上至二下。

¹⁰⁶ 《東坡志林》（十二卷本），卷十二，頁六下至七上。

¹⁰⁷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頁四三上。王宗稷所以有這樣的判斷，很可能就是看到十二卷本所載的這則文字資料。

¹⁰⁸ 蘇軾（著）、朱孝臧（編年）、龍榆生（校箋）：《東坡樂府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頁156。

¹⁰⁹ 王宗稷：《東坡先生年譜》，頁二四上。

意，而「龍蟠海表」則能突顯管幼安的德操與堅定，〈魏志·管寧傳〉注引《高士傳》云：「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¹¹⁰「龍蟠」二字更能明確此意。至於末語「其視曹操父子，真穿窬斗筲而已，終身不屈，既不得而殺」語義未明，《志林》「既不可得而用，其可得而殺乎」語義較為清晰，以示曹氏父子既無法任用管寧，亦不得殺之之意，如此才是管寧「賢於文若、文舉」處。¹¹¹ 通過這些異文，我們可以再次肯定十二卷本《志林》所錄文字的系統有別於《本集》。

五、結論

從來分析蘇軾《志林》者，多囿於十三篇的史論而以五卷本為分析對象，致使論述往往受到五卷本內容的影響，而未得其當。從南宋諸家引述《志林》的情況來看，南宋初年的《志林》蓋有兩本，一本為十三篇史論，即今天所見一卷本《志林》；而另一本則為蘇軾兒子所編的三卷本《手澤》，即「雜說」《志林》。

這部「雜說」《志林》，主要是蘇軾平日隨行所記，內容主要是有戒於世的言論，但由於蘇軾未及整理便去世，所以存留的文字很多都比較零碎，而當中不少的文辭，前人已看到可以整合的方向。

至於今天流傳的五卷本和十二卷本兩者，當以十二卷本成書較早，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東坡志林》十二卷（舊鈔本）」便記載了在趙開美刊行五卷本以前，已有十二卷本的系統，而就歷代徵引《志林》的文獻資料來看，十二卷本的成書最晚也該在元代年間。另外，從五卷本、十二卷本的對應關係來看，五卷本可能因承十二卷本。

十二卷本「志林」的分類雖然沒有五卷本那樣明確，但其序列還是有相當聯繫，甚至很有可能保存了南宋年間「雜說」《志林》相當的模樣，如南宋文獻所整合「雜說」《志林》的內容，都能在十二卷本中找到證據。由於十二卷本的成書有別於傳世的蘇軾《本集》，不但可以作為整理《蘇軾全集》的重要參考，亦有助我們更全面地理解蘇軾的作品。惜此本不為世所重，致使其價值一直被埋沒。

¹¹⁰ 《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359。

¹¹¹ 另，「商君說」，《經進東坡文集事略》（卷五七，頁十三上）題元祐三年書，惟十二卷本「志林」作元豐三年九月十五日（卷三，頁十一上）。羅振常《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考異》曰：「文指荊公行新法事，元祐三年荊公已卒，故作元豐為是。」可證十二卷本所載為宜。詳見羅振常：《經進東坡文集事略考異》，收入郎曄（注）：《經進東坡文集事略》（上海：蟬隱廬，1920年），〈考異四〉，頁十五上至十五下。

附錄：宋、元文獻徵引「雜說」《志林》內容

1. 南宋蘇軾年譜、詩文注釋

內容 ¹¹²	所見版本	王宗稷 《東坡先生 年譜》	王十朋 《東坡詩集注》	郎曄 《經進東坡 文集事略》	施元之、顧 景蕃《施顧註 蘇詩》
夢中論左傳	五卷本、十二卷本	●			
遊白水書付過	五卷本、十二卷本		●		
夢南軒	五卷本、十二卷本		●		
馬夢得同歲	五卷本、十二卷本	●	●		
廣武嘆	五卷本、十二卷本				●
黎稼子	五卷本、十二卷本				●
退之平生多得謗譽	五卷本、十二卷本	●			
道士張易簡	五卷本、十二卷本	●		●	
禁同省往來	五卷本、十二卷本	●			
僧伽何國人	五卷本、十二卷本	●			
太白山舊封公爵	五卷本、十二卷本	●			
鐵墓厄臺	五卷本、十二卷本		●		●
黃州隋永安郡	五卷本、十二卷本		●		
記道人問真	五卷本	●			
記樊山	五卷本		●		
杞人馬正卿	十二卷本		●		●
柳子厚餅賦	十二卷本	●			
鵝能警盜	十二卷本		●		
李獻之遺予天台玉板	十二卷本		●		
石屏真者必平	十二卷本		●		
吾皆所居書室前，有 竹栢雜花	十二卷本		●		●
予作蜜格，與真一水乱	十二卷本		●		
西漢風俗諂媚	十二卷本			●	
黃州小民貧者生子多 不舉	十二卷本			●	
見王鞏云張安道	十二卷本			●	
舊讀蘇子美六和寺詩	十二卷本				●
百年未滿不得死	十二卷本				●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	十二卷本				●
雪浪石銘			●		
錢塘、東陽皆有水 樂洞			●		●
賣墨者潘谷			●		
黃州定慧院東小山上			●		●

¹¹² 「雜說」《志林》本不設標題，此所記皆為相關內容的首句。惟考慮到五卷本通行日久，且多為研究者所引用，故內容見於五卷本者皆依其標題，以便讀者。

內容 ¹¹²	所見版本	王宗稷 《東坡先生 年譜》	王十朋 《東坡詩集注》	郎暉 《經進東坡 文集事略》	施元之、顧 景蕃《施顧註 蘇詩》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 日生日(李委吹笛)				•	
題文忠公送惠勤詩				•	

2. 宋代文獻

內容	所見版本	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	張昞《雲谷雜記》	樓鑰《范文正公年譜》	蘇象先《譚訓》	陳長方《步里客談》	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	呂祖謙《增注古文關鍵》	呂祖謙《觀瀾集注》	呂祖謙《宋文鑒》	吳炯《五總志》	洪邁《夷堅支志》	洪邁《容齋隨筆》	王象之《輿地紀勝》	方嶽《深雪偶談》
馬夢得同歲	五卷本、十二卷本								•						
僧伽何國人	五卷本、十二卷本													•	
賈婆婆薦昌朝	五卷本、十二卷本										•				
真宗仁宗之信任	五卷本、十二卷本				•		• ¹¹³								
記承天寺夜遊	五卷本(卷一)														•
記道人間真	五卷本(卷二)											•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	十二卷本								•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	十二卷本	•													
李斯上書諫二世	十二卷本		•												
歐陽文忠公撰范文正神道碑	十二卷本			•			•								
孔道輔為御史中丞	十二卷本				•		•								
杜正獻公為相	十二卷本				•		•								
歐陽文忠公言，晉無文章	十二卷本					•									
樂天為王涯所讒	十二卷本													•	
吳道子始見張僧繇畫	十二卷本													•	
周禮有金錫	十二卷本													•	
元豐五年十二月十九日生日(李委吹笛)									•						
題文忠公送惠勤詩								•		•					

¹¹³ 按：此則朱熹《五朝名臣言行錄》兩引。

3. 元代文獻

內 容	所見版本	王若虛《滹南遺老集》	劉壘《隱居通議》	羅璧《識遺》	馬端臨《文獻通考》	高楚芳《集千家注杜詩》	佚名《南溪筆錄群賢詩話》	吳櫟《種藝必用》	佚名《居家必用事類全集》	司農司《農桑輯要》	王禎《王禎農書》
廣武嘆	五卷本、十二卷本	●									
塗巷小兒聽說三國語	五卷本、十二卷本		●								
八陣圖	五卷本、十二卷本					●					
修身曆	五卷本、十二卷本			●							
杞人馬正卿作太學正	十二卷本					●					
退之詩曰，百年未滿不得死	十二卷本					●	●				
揚州芍藥為天下冠	十二卷本				●						
陶潛詩採菊東籬下	十二卷本					●					
故人董傳善論詩	十二卷本					●	●				
余在岐下，見秦州進一馬	十二卷本					●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	十二卷本					●					
七言之偉麗者	十二卷本					●	●				
老杜云，張公一生江海客	十二卷本					●					
柳子厚詩云，盛時一失貴反賤	十二卷本					●					
僕嘗問荔枝何所似	十二卷本					●	●				
南都王誼伯〈書江濱驛垣〉	十二卷本					●	●				
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	十二卷本					●	●				
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	十二卷本					●					
周禮有金錞	十二卷本				●						
竹有雌雄	十二卷本							●	●	●	●

蘇軾《東坡志林》成書考——兼論五卷本 與十二卷本的關係

(提要)

梁樹風

蘇軾(1037-1101)《東坡志林》雖向為世所重，惟學術界對於它的成書，以至現今流傳的三個系統之間的關係，仍未有很好的把握。本文以南宋諸家引述《志林》的內容考察，得出南宋年間流傳的「志林」蓋有兩本，一本只載十三篇史論，即今天所見的一卷本「志林」；另一本則為蘇軾兒子所編的三卷本《手澤》，即「雜說」《志林》。

至於流傳的三個系統中，學術界的研究大多偏重於五卷本。本文通過整理宋元文獻所徵引的《志林》資料，認為五卷本的內容曾經大規模增刪，絕非《志林》善本；相反，一向為學界忽略的十二卷本，不但早在元代年間已經成書，且保存了「雜說」《志林》的相當面貌。

關鍵詞： 蘇軾 《東坡志林》 《東坡手澤》 成書

A Textual Study on Su Shi's *Dongpo zhi lin*

(Abstract)

Leung Shu Fung

Three extant versions of Su Shi's (1037–1101) *Dongpo zhi lin* 東坡志林 are in circulation: a one-juan version, a five-juan version, and a twelve-juan version. Although this book is well known, not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the differences among these three versions. By examining the citations from *Zhi lin* in the work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wo different versions were circulated in the Southern Song, namely the one-juan version, which includes only thirteen chapters of historiographical accounts, and the three-juan *Dongpo shouze* 東坡手澤, which was edited by Su Shi's sons.

Of the three extant versions, most studies focused solely on the five-juan version. However, by collating and analysing the citations from *Zhi lin* in Song and Yuan documents,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 five-juan version might have undergone extensive editing, including large-scale additions and cutting. On the contrary, although few studies have been carried out on the twelve-juan version, it was completed as early as the Yuan dynasty and preserved most of the features from the original edition, the three-juan *Dongpo shouze*.

Keywords: Su Shi *Dongpo zhi lin* *Dongpo shouze* textual study